



如何看待“春节恐归”现象?

七嘴八舌

春节临近,是否回家过年又让“恐归族”开始纠结。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对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人群进行过年回家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受访者表示“为春节回家而烦恼”。其中,因春运车票难买导致的交通因素占到83%,家庭或情感因素达到35%,春节消费达到71%。此外,假期太短以及组建家庭后回农村过年不适应等因素所占的比重也在增加。(1月15日《北京晨报》)

让“恐归族”带着温暖回家

用人单位应对“恐归族”倾注极大的关爱。尽管有些单位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发给员工的工资被“缩水”,但可以挤出部分经费,给每位回家过年的员工发放“亲情”红包,让员工体会到单位这份人情关怀,从而更加珍视工作与亲情。其实工作与亲情互为补充,过好年享受好亲情,才能带着份好心情来投入工作。用人单位的这份亲情礼单给予“恐归族”无限的真情与温暖,使得“恐归族”化

解心中烦闷,带着快乐美好的心情去同亲人团聚。

“恐归族”需要亲人们亲情关怀。为了消除“恐归族”的心理顾虑,亲人们不妨打个电话或写封家书,用亲情抚慰并唤其回家过年。真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对于“恐归族”来讲,他们多么需要真情的理解与安慰啊!因此亲情的感召着重要。

除此之外,“恐归族”应当理性调整好心态,外出打拼确实不容易,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风光成就,坦然面对一切才不会让自己欠下“亲情账”。选择过年不回家,加重亲人的挂念,更增添父母心中的不安与愁绪。做儿女的,多多体谅父母,家庭才更充满真情。

俗话说,有钱无钱,回家过年。团聚是幸福的分享,是亲情的洗礼。“恐归族”的出现需要社会的关怀与帮助,多给“恐归族”一点温暖,让他们带着温情与美好上路吧,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才更加和谐与温馨。 郑文

“七成人不愿回家”是个伪命题

明明是近七成的被调查者“为春节回家而烦恼”,但在新闻报道中所得出的结论,以及大量网络转载的标题中,却被断章取义,改为“七成人不愿回家”。可见,这又是一个“标题党”式的新闻,扭曲了调查结果,所谓的“七成人不愿回家”只是个伪命题。

公众不必对“七成人不愿回家”的调查结论太过敏感,在没有看到相关调查范围、调查问题、抽样结果等调查数据之前,很难判断此项调查是否科学,

是否存在人为捏造的情况。如果有心观察的话,类似的调查报告还有很多,“七成人”怎样的结论也随处可见。比如“七成人相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七成人洗手姿势不正确”、“七成人留学是为增强竞争力”、“七成人对食品没有安全感”、“外来务工人员中七成人打算春节返乡”等等,如此缺乏精确数据支撑,含糊不清的调查结论,怎能让人信服!

调查本来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

真实有效的调查数据则是调查报告的基石,而即便是针对同样的调查内容,如果统计模式、抽样标准、问题设计方案等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更何况,在我们这里,由于缺乏严格监督和透明机制,伪造调查数据、扭曲调查结论的事情常有发生。公众对于各种调查结果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相信,要秉持怀疑的眼光去看,而对于某些明显违背常识的调查,不妨一笑而过。

江德斌

W 微评论

wei ping lun

姚明“挂科”只是一个“美好愿望”

乔志峰

姚之队:姚明并未挂科,高数38分系谣传。近日,网络传言称姚明在上海交大学习期间高数只考了38分。1月14日,姚之队做出了官方回应,称姚明成绩很好,没有“挂科”的情况出现,高数38分的说法是谣言。姚之队表示姚明的考试成绩绝对是及格的,已经得到了上海交大的证实。(1月15日《北京晚报》)

人非圣贤,谁能没有一点弱项哩。姚明即便当真“挂科”,亦属正常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姚明之前也曾表示:“数学是我头痛的东西,因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知识比较系统,前面的功课缺一点,后面就很难连接得上。所以数学现在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最困难的。”即便著名如姚明,亦难逃脱高数折磨。我真的弄不明白,非逼姚明把高数整明白,到底有多大意义乎?所以说,姚明“挂科”的传言很可能只是一个“美好愿望”——期待中国的教育能摒弃“一刀切”和“流水线作业”,因材施教,尽量为学生发挥个性、扬长避短创造条件。

“和谐文化”无关“创意”

马涤明

一次有价值的文化创意,只要执行得当,可能带来超出寻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省政协委员刘立平昨天向记者介绍他的一份提案,建议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澳门登陆点塑建“和谐女神”。(1月15日《南方日报》)

“文化创意”,确实有这种产业,搞得好的能挣大钱。只是不知道,刘立平委员的“和谐女神”提案是如何评估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而我以为,“和谐女神”的效益之说,不管是“社会”的,还是“经济”的,都不大靠谱,第一,当和谐社会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之际,一个人造的“女神”不但显得多余,而且因为刻意而感觉生硬,有逢迎投机之嫌。第二,“女神”与“经济效益”关系几何,叫人更困惑,提案者是认为它会带来旅游收益,还是说因为有了这个“女神”,外边人便因为这里和谐而放心来投资创业,所以经济效益将“超乎寻常”?不知道提案者有无详尽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反正我是不信。

我认为,所谓“标志性文化建设”,绝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塑像,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样一种博大精深的主题与内涵,更不会是一个人工的塑像能够承载或“标志”的。它需要国家作出艰苦的努力,有效的沟通,以及务实的行动与成果,才可能将“和平崛起”的理念展示于世人。多一个塑像或许至少没有坏处,但是说“超乎寻常”,是否有浮夸之嫌?

“产业”上的文化是不排斥创意的,但是表现一个国家“和平崛起”的文化标志,与“创意”的概念是绝不搭边的。国家文化,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只能由积淀而来,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民族思想文化精髓,乃是千百年传承与弘扬,并被广大国人认知认同与推崇而成。而一座孔子圣人塑像,它绝不仅仅是一座塑像,因其承载着太多的历史积淀与国民的共识和信仰,才可能产生“社会效益”。

F 非常道

feichangdao

“现在,除了动画片,我不敢带女儿去看其他影片,不适合未成年人的电影院的宣传海报中并没有提醒。”

——时值寒假,孩子们终于有机会走进电影院或在家中享受“影视时间”了。但现在的一些影片越来越低俗,家长们又担心容易对孩子产生误导。

“他那一双从垃圾里捡破烂的手是人世间最干净的手。”

——62岁的王长兴老总是上蔡县杨屯乡田庄村人,9日下午5时许,王老汉走进驻马店市区置地小区,逐幢楼地从垃圾箱里捡破烂。没钱过年、进城捡破烂的王长兴老总,在楼下捡到6900元现金后,爬楼逐层寻找,终于找到了失主。

S 时事乱炖

shishiluan dun

拾金不昧不是易碎品

1月11日,陕西人杨师傅将捡到的钱包归还失主,因向失主索要10元早饭钱,遭到对方辱骂。(1月15日《京华时报》)

因为女孩拒绝感恩,让这个可贵的拾金不昧变成了“易碎品”,既伤了双方的和气和感情,又伤了公共道德。杨师傅为讨要区区10元钱“好处费”穷追不舍,甚至用电话、短信频频骚扰失主,已经让拾金不昧的初衷和善意荡然无存。

可见,在当今社会,拾金不昧不仅需要道德和良知,而且还需要失主胸怀感恩之心。当然,感恩并不需要给予多少物质和金钱的回报,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激。

然而,对于拾金不昧者,让其“善有善



报”,有体面有尊严,也是情有可原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拾金不昧者向失主索取回报的尴尬事件发生,才能让拾金不昧等社会美德成为一种常态。

汪昌莲/文 美堂/图

R 锐评

rui ping

“三好学生”评选不能成为“福利工程”

钱兆成

家长质疑“三好学生”泛滥,校长称是顺应“需求”。“正是升学需求和家长的这种‘要奖’心理让学校在评奖问题上很难办,有时不得不增加名额顺应‘需求’。”南京一位知名小学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表示。(今日本报10版)

三好学生,是一个用来评价一个德智体三方面均为优秀学生的荣誉称号。如果“优秀”称号仅仅属于一种“精神鼓励”倒也罢了,在这“理论联系实惠”的年代,人们都看到类似荣誉称号的含金量。无论如何解构“三好”意义,它的价值就在于在同等条件下一个学生比另一个学生有优先权,尤其体现在工作,升

学上面。最差的作用也可以哄家长开心,给家长长面子,赢得家长的物质奖励。

在一个教育资源日益商品化,家长是顾客的年代,为了减少或缓解矛盾,维持“和谐”局面,某些学校的领导“想家长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遂把这在上看来原则性很强的“评优”搞成了一项不折不扣的“福利工程”。一打三好学生,个个受表彰。

这项“福利工程”的“游戏规则”便是:“排排坐,分果果”。庄家轮流转,每年到一家。反正只要学生平时踏踏实实,这“优”字迟早会大驾光临。本以为家长们应该一团和气,但事实是某些家长们出于竞争的

需要不愿意领这个情,并且笔者以为这样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也与“评优”的初衷相去万里。

笔者认为,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应该合情合理,但事实上,到了某些基层执行者那里便成了“合情”而“不合理”。诸如“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一是原则性很强,二是牵涉到学生的切身利益,故必须慎重对待,认真处理。与其让其在执行中变味,不如干脆取缔。例如呼吁取消“三好学生”评优的声音屡屡出现,也有社会心理市场。否则,拿着原则当福利(甚至当人情),损害的只能是学校的形象和政策的声名。